

貴州民意

The People's Opinion of Kweichow Monthly

第四卷

Vol. IV. No. 4.5



貴州民意月刊社編行

地址：貴陽市陽明路

電話：七五六

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每冊零售定價國幣一萬元

評經——檢舉貴陽市違法變賣公地（人）

紳士和紳士政治

歡迎谷紀常先生回黔主政

我對楊子惠先生治黔的觀感

我們對於省政的期待

貴州煙毒瀰漫

最近三年來黔政一瞥

檢討貴州省五年建設計劃第一年的成果

專——貴州省參議會審查貴州省政府廿七年上半年度歲入歲出

名著選譯：英國的新民主主義

地方通訊：道真監獄

青年園地：榕江拉樹節前後

讀者提書：敬慶民吁彌書
一件小事的檢討

市三國書

涂健君譯
許明之
雲仁雲夫盟

懷軒時柔道
麟雨謙恭懿謙

短評

檢舉貴陽市政府違法變賣公地

公地可以變賣，但其變賣必依法。貴陽市的公地當然不能例外。

貴陽市近一月來，因為主席的更調，變賣公地則不依法。不依法變賣公地，自買自賣，顯然是違法的。

這次公地的變賣，不在一月前，亦不在一月後，而恰在新任未到，舊任將走的期間，而且事前不公告，事後復行賄，這其中的道理是不難想像的。

照貴陽市現時地價而論，每畝價可自數百萬元數千萬以致數億元不等，縱是荒山也絕無二萬五千元或五萬元一畝的。而市政府這次却以二萬五千至五萬元一畝的低廉價格私相受授，期間於新舊交替不接頭時混水摸魚，趁火打劫，擅登天理，人情，國法所能容？

而且這次買賣據說先由市府高級職員提議并購取，然後及於其他一部份職員，但因分贖不均，事為外人知，於是大行賄賂。勾結一羣不肖的地方權貴，私下分贖，分贖的人據說有委員，有主任，有長字號的大人先生，更有民意機關代表，他們用其妻室兒女及其關係人的名義，盡量套購，寫了簽呈當面去請兼市長「御批」後，於是漏夜的趕發土地所有權狀。並且據說為了免除市參議會立法手續的抗議，便給市參議會其要角一人卅餘畝地之多。

我們聽了這個消息更聽到人們的嘖言，我們真想不到貴陽市政府在這期間會做出如此醜惡的勾當。這件事是真還是假，要說是假，又有鐵一般的事實，所以我們不得不向社會及國家提出控訴。願國家與社會以法及輿論處置這些不法之徒。

這種無恥無法的買賣雙方，作假公濟私的行爲，誰應負其責，無疑地，主辦者和貪便宜者不能辭其咎的。

我們國家到今天，已經亂到快要不可收拾的地步，執法人人和監督執法者還如斯傷心病狂，何以叫人民信仰？所以要是這些人還有良知，尚有一點悔過的良知，我們想，這些人應當自殺以謝國人，因為這種買賣，簡直形同盜賊無異，要不然，今後國法還何以推行？更有誰尚願奉公守法？所以我們更願作進一步建議：

這次貴陽市變賣公地，既然違法，法院，及省府應依法處理。

第一、應當宣佈此次違法買賣的無效。

第二、利用職權買賣此次公地的官吏，應當不論其官大官小，一律以貪污論罪。

第三、人民購得此次變賣公地者，應一律沒收，並勒其登報表示錯誤，以後決痛改前非。

因為貴陽是省會所在，全省首善之區，在省主席辦公所在，尚且如此，聽其自然，甚至承認既成事實，那麼各縣縣效尤，貴州今後貪污處理的試驗的。同時，我們更願提醒貴州縣的監察委員先生們，要是你們沒有放棄職責的意思，願你們不要熟視無睹。（人）

紳士和紳士政治

馬懷麟

紳士，是鄉土中一種有權勢而無權位的富豪人物，他們不是官，而是官的「殺角」也是官的「起頭」——官解職後回到家鄉必然是紳士。紳士的門庭裏不斷地培育出「新官」來，紳士階級處於「新官」與「舊官」之間，「舊官」是他們的過去，「新官」是他們的「將來」，在過去的「光榮」與未來的「光明」照耀下，紳士在鄉土中自然成了光輝燦爛的顯赫人物了。

紳士必然是地主（富），知識份子（貴），舊權勢的承襲人（豪），湊合這三種因素天然地取得豪門資格，豪門是「舊官」與「新官」的過站，紳士是鄉土中的顯赫人物——跨在民衆肩上的「騎士」，於是對付「官」他們有「技術」也有「本錢」！對付「民」他們有「身份」也有資格，在官需要他，民聽從他的條件下，他們天然地又取得「官」與「民」之間的「牙子」地位了，「牙子」在「官」「民」之間連接着「官」「民」，也隔絕着「官」「民」，在這連接與隔絕的當中，放過了些什麼，阻隔了些什麼，這種「放過」「阻隔」就是紳士政權，這些「什麼」就是以紳士為綱的紳士政治。

中國歷史上很少成系列的家族政治，而紳士政治確是與專制政體同壽命地發展着，就連改朝換代的形式變革，也從沒有殃及過「池魚」，因為紳士政治，實即是專制時代的基層政治，改朝換代不過是政權的轉移與政治性質無關，即與基層政治無關，不過在「改」「換」的時候，大家觀望着「改了」「換了」的時候紳士們事卻與民北面而朝新天子，仍然協助新官一貫的幫閑，幫忙，幫兇的工作，就這樣跟了新王朝底「萬壽無疆」又往前發展了。

專制皇帝是拿紳士做他們的腹心基幹，專制政體是拿紳士政治做他的普遍基礎，專制皇帝存在，紳士必然也存在，專制政體存在，紳士必然

治也必然存在。這個推理是十分正確的，但是由專制到民國，基層政治仍然落在紳士的手中，這又從何說起呢？這是一個有趣的發問，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由專制到民國，理論上應該是一個政治變革，不應該是一個政權的移轉，但按諸實際（站在社會本質的觀點看），除了政權的移轉外，實在沒有多大的變革意義，至少可以說這只是一次不徹底的變革，「打倒一個大皇帝，生出若干小皇帝」的鬧劇，這個「不徹底的變革」，就「變革」實只是「打倒一個大皇帝」，就「不徹底」實是「生出若干小皇帝」，「小皇帝」就是紳士，就是舊政權的基層領導人物，民國的旗幟展開，他們仍舊慣地「北面而朝」，「民國萬歲」地走着舊路，民國革命社會的本質沒有得到徹底的變革，但確實是社會變革的開始，這是欣喜的一面，民國以來的各種作為，政府方面護國護法，北伐，剿匪，社會方面的新文化運動，反帝運動……等都是大皇帝倒後各種間接向小皇帝進攻的行爲，也就是社會變革的繼續發展，可惜這些作為仍就不徹底，仍然給紳士留有足夠的社會根據與條件，紳士們抓住他們的根據與條件，穩健地作適應性的發展，以新的姿態出現了，這種新姿態的紳士，我們叫他做「變種紳士」，這種「變種」事跡，是極堪注意的變種資料，我們想在這裏追述一下：

由專制到民國沒有做到徹底變革，但展開了變革的序幕，我們可以歸成爲下列幾個概念：

首先是正統牌子之破壞，大皇帝所統率的那一套所謂「名教」連同他自己的家產一齊被搗毀了，這個搗毀雖然只是表面文章，只是換換招牌，但至少算得「一新耳目」，根據這「一新耳目」？社會獲得的作用是：

其次精神上的解放，人們都很興奮地談革命，談自由平等，觀念上「一致崇拜」穿白盔白甲的革命黨」，必致取於大呼「造反」！這種精神上的造就，在於輕鬆地踏過實在的艱難階段，同時「物質文明」在我們的領土內擴大深入其作用，西洋貨，東洋貨排山倒海地沖進來淹沒了我們的任何一個組織細胞，農村開始破產，人羣大量地往都市裏流，往其他地方流。

總之大皇帝倒後，人們夢囈地嚷着「自由」「解放」，再加以物質條件的艱苦，於是我們這古老大國便鬧得地鬧着，蠢蠢然地動着，好像很興隆的樣子，這時政治上的特徵是放寬了鎮壓的尺度，增多了活動的方面，在這非常熱鬧的場合裏，紳士們呢？他們左顧右盼地要變了，也因為政治上的新感染，物質上新誘惑和下意識的新刺激，但是客觀上變革程度規定着紳士們可以變也可以不變，而主觀上則是得道者飛昇，無功者仍歸回原系列，前者我們稱他「變種紳士」，後者我們稱他「鄉土紳士」，變種紳士和鄉土紳士的存在不是對立的而是銜接的，不是矛盾的而是融通的，總之在本質上他們都是一丘之貉，只是在姿態和作法上有些差異而已。

第一鄉土紳士是靜態的，變種紳士是動態的，鄉土紳士好像是「坐地分肥」，變種紳士好像是「吃賣官飯」。

第二鄉土紳士是「豪門」的姿態出現，變種紳士是以「豪客」的姿態出現，豪門人就之「坐地分肥」，豪客就於人「吃賣官飯」，這是因為鄉土紳士是「地頭蛇」，對他的環境剛剛高打一張，而變種紳士則是「運方門神」對他的環境剛剛低一着。

第三鄉土紳士的自然空間是鄉土，變種紳士的自然空間則在鄉土與異地之間，縣城與省城之間，省城與京城之間。

第四鄉土紳士的社會空間在「官」「民」之間，變種紳士的社會空間在「官」「紳」之間。

第五，鄉土紳士講「實」，他們實實地站在民衆的肩頭，變種紳士講「勢」，空空洞洞地玩花頭，因為他們處在半天雲裏還探頭進了南天

門。

變種紳士與鄉土紳士儘管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這種不同，實在是「同而不同」，因為他們都是社會的有權勢而無權位的寄生階級，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由「鄉土紳士」變成「變種紳士」的「變」也不是本質上的變，只不過姿態、手法、觸角有些不同罷了。

鄉土紳士向外發展，最初也是很吃力的，因為失去了地頭蛇的優勢，好在不是斷線的風箏，還牽着家鄉做本錢，雖然飄飄蕩蕩，不久也便安定下來，安定下來學習新環境生存的本領與技術，最初不過東奔西走，窮鄉附屬，學子面，謬派頭，探索行情，補充常識，革新衣冠，舉止，變成時新人物，久而久之之禮之居然暗地裏設計謀，開枯條，場面上講大勢，論興革這是變種紳士的第一階段，他們刷新了，也安定了。

日子再久一些試探着閃閃灼灼地當起家鄉的代理人來，家鄉人本來是散漫，粗獷，疏懶的，沒有誰會重視這種盜竊之漸的行為，因之沒有人反對，也沒有誰贊成，日子愈久，胆子愈大，居然拍拍胸膛，以代表某省某縣的姿態出現，「上邊」要胡亂亂的時候，順便就拉他們出場，竟至成了例規習慣，習慣！人數的存點就在這方面發生作用了，變種紳士便在「不承認的承認」下，取得了家鄉「黑市代表」的資格，「上邊」遇有關係家鄉的事情，都要顧問甚至取決於他們，這是變種紳士的成熟階段，他們取得賣客條件，也就開始出賣家鄉了。

「鄉土紳士」做「牙子」，「變種紳士」做「賣客」，「賣客」吃的是武辣飯，那嗎他們的武器呢？他們的武器有兩個，一個是「之間」，一個是「惡化」。

「之間」本來不是「武器」，是一個縫隙，是變種紳士們的生存空間，其實嚴格算連空間也不是，但是在變種紳士們的手上，居然生出奇跡了，是他們的空間，也成了他們的武器了，這正是「把戲是一套，各人的要法不同」，「之間」本來沒有「空間」，沒有「空間」的「之間」，要生出「空間」來，全靠「變化」，一種無中生有的奇跡，「變化」的「之間」，就是「空間」；「之間」的「變化」，就是武器，因為上

下「之間」，官民「之間」，官紳「之間」，省京「之間」，都是若干套矛盾的結合，「之間」被紳士們掌握，這「結合」也就被紳士們折住了，成了無敵的武器，「之間」「變化」雖是兩套，作戰的時候確是總體使用的。

變種紳士們本來是「變」的，但也有變中之不變的常態——兩副面孔，兩個姿態，和兩套人格，這些變中之不變在「之間」裏發聲排洩出的東西，那可太多了，對上裝奴隸，對下裝主人；對上拜乾爺，對下收養兒……其實這些等等切切，都是虛情假意，那嗎他的本來面目呢？收檢到那裏去了呢？我們認真查看起來，根本就沒有本來面目，根本就沒有他自己存在，因為他是在沒有「空閒」的「之間」裏生活，在沒有「空閒」的「之間」裏弄技巧，一種沒有空閒的存在意義除了一些使人眼花繚亂的花頭技巧外，實在也就找不着什麼東西了。

我們分析變種紳士說「之間」便是他的「空閒」，嚴格言之，實在沒有「空閒」，乃至沒有他自己，「變化」裏也有他的「不變」嚴格言之，實在也沒有「不變」，乃至沒有「姿態」，「面孔」和「人格」，那呢，變種紳士到底在那裏？我們只好用神話來解答，在照妖鏡下，變種紳士化成一灘汚血了。

在國家行憲開始的今日，虛無飄渺的變種紳士又是需要變，而有利於變的時候了，但願照妖明鏡高懸，民衆的眼睛放亮，對官紳的勾留，即不能剪除，但也應該透視過大概。

對「民主」我們不敢作過高的理想，但我們可以看成黑壓壓的地窟裏開放一個小窗。人們都需要陽光和空氣，窗口開得太小，自然爭吵不休，但唯其窗口小，故覺其可貴，惟其他窟裏。在一線光明下格外看得清白，在這樣的情形下，變種紳士們都感到一種「光」的威脅，一切黑市交易行為都沒有從前那末方便了，首先老百姓可以「打開窗子」說一點

「亮話」，其次老百姓們可以抬起頭來，放眼瞭望，於是變種紳士們高而扯腳的黑幕被撕破的瞬間，變種紳士們來不及躲藏，來不及變化，於是老百姓們看穿他們的過去，好像捉小偷一樣的滑稽。

變種紳士們雖然是以黑市的手段，出賣民衆，但却高呼是民衆的「代表」，他們果能站在民衆的立場做事，老實的民衆「近水樓台」是會讓他們先站一著的，然而這種「代表」也變了種，不是「代表」而是「代替」，代替老百姓的意志，代替老百姓的利益，甚至代替了老百姓的人格。後來這種「代替」也變了種，不是代替而是「出賣」了，老百姓變成他們的私包袱，零典整賣聽他的喜歡，在民主聖孔之前，大家嚷起來了：自己的意志在那裏，自己的利益在那裏，自己的人格在那裏？答案是都被出賣了，出賣給誰呢？……看樣子買主到是純潔而無辜的，不然為何連那點「校人」的迷惑都「弄不清楚」呢？未免太過於中庸了，地方人本來是樸實，公道，熱忱的，今一旦把變種紳士作為地方人的標準模型，從那種人的人格，行為，意志判定地方人的臉譜，真太危險了，假若變種紳士還留有一條尾巴，則全地方人不都被人想像成爲原贖人種了嗎？老百姓不由的憤怒了，同時也防禦地提高了警覺，因為善變的幽靈，在民主選舉當中，仍會很快地偽裝起來的。

民間傳說一個神話：一株芭蕉成了精，常常變成各種面貌的女人，和年青的男人糾纏，人們由愛慕而恐怖了。但終於找不到他的根底有一夜她纏上了一個青年的裁縫，裁縫厭着恐怖立志要爲地方除害，當着他和她玩得迷惑的時候，他偷偷地掘出一根帶有紅線針插在她的衣服上，第二天青年裁縫帶着人到處找尋，發現那根帶有紅線的針，插在一株大芭蕉的葉子上，芭蕉精就被衆人剷出了。

我們想地方人不少青年裁縫的智慧，請大家注意看誰的衣服上插得有帶紅線的針。

本刊歡迎 投稿， 批評，

訂閱， 交換。

歡迎 谷紀常先生回黔主政

新

自從中央決定谷紀常先生回黔主持省政的消息傳到貴陽，一般本籍人士，莫不欣然色喜，奔走相告，爲貴州的前途慶幸，熱情的表示歡迎，雖然，這些安份善良的人們，因爲沒有組織，沒有領導，不能如那些有名望的仕紳，社會名流，可以集會請願發布新聞，文電，表示意見。但在他們傳遞這一消息時，每一個人嘴角上所包含的微笑，眼神上所顯露出的興奮，我們是不難明白他們內心的愉快與歡迎的熱忱的。

四月二十九日三橋的迎官道上，有幾個老年仕紳，曾經以「我們等你來，等候得太久了」。爲歡迎詞。這「確是千萬個貴州人的呼聲！而這種單，樸實誠懇熱情的辭句，却包含着無限的辛酸和熱淚……這種純潔熱愛的心情，是真實的民心，是無價之寶，與一般官場上敷衍，應付的筵宴，集會，舊式的攀轅，臥轍，致送萬民傘，德政碑，新式的獻花，獻詩，通電挽留，大登廣告，頌頌功德……之類，本質上毫無相似之點，也絕不能將兩者相提並論，權衡輕重的。

人們何以會這樣歡迎谷先生哩，我們決不能單純的以谷先生是本籍人一點來解釋。因爲，這樣正可能給若干攻擊貴州人小氣排外的人予口實，我們應該從十多年來，貴州人民所深切感受的苦痛經驗中，去找出其所以產生排外思想的因子，才能正確把握他們衷心歡迎谷先生的真實理由。

自從中央軍追剿「匪共」入黔，結束軍人割據局面，切實掌握地方政權以來，歷屆行政首長，均爲外籍人士，他們的政績如何？是功是罪？絕非這篇短文可以詳細論列。爲避免無益的誤會計，更沒有放馬後炮的

必要。但爲要揭露真實，我們却不能不指出一點，即在調協地方人士間之情感上，沒有一個是成功的。有人以爲國家的政令要向人民徵兵，徵糧，徵稅，徵工，……根本與人民的利益不能符合，要討好老百姓，就不能推行政令，完成任務，俗語說：「當家三年狗也嫌」，何況負責一省的行政首長？這種話，粗略聽去，好像也不無理由，究其實際，却不能不認爲是文過飾非之論。我們且不談民主國家的官吏，是人民的公僕，那些距事實太遠的高調。無論如何，貴州人民之模實，馴順，却是無可否認的。完糧，納稅，當兵，是人民對國家應盡的職責，他們是深切了解的。他們之懷怨，是暗無天日，貪污橫暴，額外苛擾的結果，並非由於不願負祖國的正供。

他們，認爲自己是被征服者，被壓迫，剝削的奴隸；眼睜睜看着許多至親，好友由小康淪於赤貧；自己鄉土的財富，被人當作戰利品收割榨取，運出省境。看着許多才德優良的地方人才，被屈抑迫害，爲生活改業，或流落省外；而許多庸愚無知，勾結外力，橫行不法，魚肉良善，在金融，眼看黔地方上的孝民壞蛋，勾結外力，橫行不法，魚肉良善，在金融萬能，賄賂公行的人事制度之下，小民的骨髓也枯竭了……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壓迫，使他們對現實發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而將一切怨毒都集中在行政首長不是本省人這一點上。他們，以爲，假若省政是由一個本籍人主持的話，絕不會受左右少數人的朦朧包圍，對地方上民生的痛苦，這樣隔膜無知，無關痛癢，最低限度，也不會帶這樣多淘金者來殘害地方的。二十年前的周顯斌主席，多麼令人懷念啊！貪污盜匪絕跡，

夜不閉戶，路不失遺，各安生業，省庫充盈……地方上一切教育，文化，交通，生產事業，都有進步；而他，不過是一個不學無術的舊式軍人，僅僅做事比較有毅力決斷，勇於負責而已，——這就是一般小市民熱忱歡迎谷先生的理由，也就是一部份外人籍以爲本地人天性小氣排外的癥結所在。

同時，中國人數千年來，在儒家學術思想的教育與薰陶之下，一般人的鄉土觀念非常濃厚，外籍的行政首長，隨之而來的，是大批的外籍親信幕僚和幹部，大幹部又必需帶小幹部；他們，爲了要維持，安插不遠千里而來追隨的同鄉，自然不能不排擠裁淘本籍人，而這些人，有意無意間所表現的輕視貴州人物的言論，舉動，以現代王陽明自居，前來開化貴州的倨傲行爲，實在深深的刺傷着每一個人，本籍人的自尊心，雙方的成見裂痕，安得不日愈加深哩！……

谷紀常先生終于在同鄉人之熱望中回來主持省政了。爲桑梓的利益與幸福我們渴望：

(一) 根絕貪污，澄清吏治。貴州人最近幾年來所深切感受的最大痛苦，莫過於官吏之貪污苛擾。谷先生曾經說：今後的施政方針，將在「進步中求安定」，真的，假若我們的用人行政，不力求進步，改絃更張，要求社會安定，人民安樂，根本是不可能的了。貴州吏治腐敗，貪污風氣熾烈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許多外來的淘金者以貴州爲獵場的結果，以谷先生之剛毅果斷，清廉自好，再證之以主持甘肅省政時的廉潔作風與優良政績，其必能以大刀闊斧的手段，披荊斬棘，乃毫無疑問之事。不過，一件事情的成功，需要堅強的決心，更需要有週密的計劃，怎樣選拔培育人才，裁減駢枝機關，開源節流，籌劃財源，改善待遇，乃根絕貪污，澄清吏治的先決條件，單靠嚴刑峻罰，是不會有多大效用的。

(二) 消滅派系小組組織之明爭暗鬥。過去的貴州，同志間派系之角逐極烈，互相排斥，競爭，傾軋，陷害，有若寇仇，流弊所及，各方均不以本位工作爲重，一切用人行政，均惟小組組織之利害是從。其玩忽

職守，包辦把持，爭權奪利之種種行爲，實爲有識之士所深切痛惜。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由各方之舊嫌積怨已深，成見莫由化除，互信無法建立，而外籍人士之有意挑撥，分化，陰謀以火上澆油之政策，促使尖銳對立，分裂，同室操戈，俾其能坐收漁利，乃爲問題日演愈烈之主要關鍵。因此，假若谷先生今後能以超然的立場，執行家長的任務，本大公無私，不偏不袒，嚴厲制止私鬥之原則處理，則一切派系衝突均可在精誠感召之下合理解決，行政效率自然提高，私利之爭亦不難轉移爲互相間之工作競賽，其有益於地方造福人民，實爲巨大！

(三) 促進增產建設，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經濟建設之重要，任何人都知道，也都會說，但真正的建設，是應該與實際的民生發生密切關係的。決不是擬定一些空洞的，表冊計劃，敷衍應付，或是經營幾個無足輕重的工廠，或是修造幾條馬路，學校，體育場，公園之類的畫眉粉飾政策就可以交代完事的。我們當然知道，政府當局，在人財兩缺，層層束縛牽制之下，處境至爲困難，實不易有所表現。但惟其貴州是貧瘠之區，我們愈發應該慎重用錢，使每一文可以盡用的錢都用在最有用，最該用的事業和時機上。我們以爲貴州的經濟，仍然停止在原始農業生產的階段。增產建設應該以振興農田水利，提高農業技術，推廣農村副業，活潑農村金融，繁榮農村經濟爲主。發展交通，促進貨物其流，扶持工商事業，爭取國內外投資，開發礦產水力爲輔。我們要深切了解，在農村經濟急劇貧困化的情況下，社會秩序之安定是無法保證的。貴州這幾年的小康局面，絕不能歸功于任何個人的政績，而是糧食生產差可自足的結果。今年由于多種菸葉之大量種植，糧食生產已大受威脅，若不幸天時荒旱，或鄰省歉收，則問題之演變，將不知嚴重到怎樣的程度，產生怎樣悲慘的後果，因此，我們亟願提請省府當局密切注意，預籌具體有效之對策！

(四) 增強自衛力量。現在中央的國策，是戡亂第一，但戡亂軍事，絕不能單靠軍力解決，已爲人盡皆知的真理。許多人由于認識不夠，不是偏于過份輕敵，即是偏於過份懼敵。其實，敵本不足懼，我們自

已的政治經濟無辦法，才是最堪憂慮的問題。假若我們能够安定民生，穩定惶恐動搖內人心，則在沒有民變內應的條件下，即令其能够順利渡江，竄擾川湘，亦易入侵省境，否則，自發的騷亂，我們亦將無法杜防，也將無力鎮壓。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以復興西歐經濟，為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政策，即根源於是項認識。因此，我們要增強地方自衛力量，應該以繁榮地方經濟為基本辦法。而繁榮地方的首要，在安定民生。人民生計之安定，則又以澄清吏治，根絕貪污為先決條件。有人以為今日的中國，應該援用咸同年間會，左，平定太平軍之辦法，以保衛家鄉為政治號召，以編練團勇為軍事策略。閣主任在山西，傅主任在察綏，能够在四面圍攻中掙得住，即由其有一套辦法，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適應環境，可以與「匪共」對抗的原故。然而，形成一套辦法，並不是容易的。譬如：以保家鄉為號召吧，從上至下的人，都要能够以家鄉的利益，為最大利益，切實力行，一心一德，才能建立信仰發生力量。假若會左諸人，沒有崇高的私人道德，以精誠感召鄉人，是不可能組織這樣多才幹優異的幹部，也絕不會有人熱誠的甘願犧牲自己的性命，替他們建立功業的。

同時，地方團隊，應該如何編組訓練？才能切合實際需要，不致浪費民力，虛耗國帑，耽誤農作。……軍需，械彈，糧秣，應該怎樣源源生產儲備補充，才能應付非常事變，不失時機，勿虞匱乏。凡此種種都是極關重要的技術問題，需要週詳考慮，切實計劃的。

總之，貴州的現實情況，並不如一般人所宣揚，粉飾的那樣優美。不僅不是「聖地」「樂園」，其危機之嚴重，亦並不亞於鄰近各省。祇不過如像一個患毒瘡的病人，尚在化濃的潛伏階段，病狀沒有表面化而

已。從前因為監護人不歸痛癢，祇以自己的顏面為重，不惜以病人作犧牲，故意誇耀健康進步。現在自己的親人回來了難道還應該忌諱諱諱嗎？

以上所列各點，乃針對目前現實要求，擇其最關緊要者作原則下之概述，除第二項消除派系爭鬥，乃對黨內同志之問題外，其餘各點，莫不與將來之施政方針有密切之關係，我們希望熱心桑梓的每一個貴州人，提出具體有效的辦法，貢獻給谷先生，也希望谷先生以泰山不讓土崩，河海不擇細流的雅量，接受一切意見。綜合起來，披砂選金，製定一切實可行的工作計劃，驅為目標，領導一千一百萬貴州人民，走上富強康樂的光明大道。

行憲以後，地方政府的權力增大了。責任也隨之加重了。谷先生是貴州人，他的成功，是貴州人的光榮，他的失敗，是貴州人的恥辱。為桑梓的幸福，為我們自身，家族的繁榮，我們應該在他的領導之下，團結為一個堅強的整體，努力工作奮鬥，使貴州成為一個模範省區；將貴州人的優良品德——聰明誠樸，勇敢耐勞……的精神，儘量表現出來！到那時，貴州是「聖地」「樂園」的宣傳，才會百分之百的兌現，才名實相符，不感慚仄！

我們貴州人，絕不能讓人家批評天性小氣排外之後，再被人批評無自治能力，天生的奴性！而谷先生哩，我們也希望他嚴正，剛毅果斷的優良品德，治到好處，沒有偏狹，固執的現病！因為，一個正直的人，常常會「好潔成癖」「嫉惡如仇」流入偏執，而一個成功的領袖，却需要寬宏的度量，才能容納各方面的人才，棄短取長，完成成功啊！

要上期本

短評：教育界不能容貪污（人）
對本省監察委員會之希望
我對這次國民大會的看法
目前我國國民經濟問題
由體驗得來的改進選舉意見
王守論章定謀等

馬增中
梁聚五
郎德沛

人物：論周西成
今日教育界的醜惡現象
青年：除夕
清道夫

丁道謙
涂德君
黃啓彬
陳若塵

我對楊子惠先生治黔的觀感

祝時雨

楊子惠先生治黔三年有餘，對於黔政的措施得失如何，雖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現階段的新貴州建設乃至國家建設的一般問題，我們如能作客觀的研究，姑無論其所得結論如何，都是很有意義的事，不過在這裏我不敢說是研究。只能說是一種觀感罷了。

首先要聲明，就是我們對於某種政治措施的觀察，自然不免都要牽涉到人的問題，所以必須屏除一切主觀意氣與情感的成份，才能得到比較接近真理的結論，也才可以免掉人與人之間的誤會，又必須能在大處着眼，才不至於吹毛求疵，必須接觸事實與體認事實，才不至於隔靴搔癢，我們近年來以提倡「對事不對人」的民主精神為職志，反對以私人利害或主觀好惡來衡量政治上的公是非，反對以「地域觀念」或「對人問題」為出發點來論事評人，同時我們以在民意機關服務的關係，直接參與貴州政治，對一般政治情形也不至於怎樣隔膜，所以我們對於貴州政治措施的觀察，自信不會不客觀，也不會太不著邊際。

我們談楊先生的治黔，是側重於建國工作也就是地方建設工作方面，楊先生於民國三十四年到任，承黔南事變之餘，對內自然是竭力從事於恢復秩序與安定人心的工作，對外仍是一切為了抗戰，兵源的補充，餉糧的供應，大致都是率由舊章，無所短長，是年八月抗戰結束，才開始作平時建設工作之準備，三十五年四月今總統蔣委員長蒞黔指導及正式省縣參議會成立以後，才有建設新貴州若干口號的提出，而五年計劃的宣布，還是去年七月的話，五年計劃的本身如何，留待下文再行討論，但從計劃宣布到現在，為時不過八九個月，可說還是在一種預備姿勢之中，同時又因實行大選，故能實際根據計劃着手進行的工作當然有限，由此可知以此短促的三年時間在政治建設工作上實在不能做些什麼，何況財政的困難，人材的缺乏，人心的障礙，所謂政治建設，談何容易，當然我們也不能盲目的苛求，然二年之間，由於楊先生個人的直接努力和一些省縣幹部的苦幹，確實也有許多局部成績的表現，不過不是整體的或全面性的而已。

先由個人方面來看，楊先生的精力與熱忱及實際的精神與規律的生活是值得稱道的，他在工作上不但用心，而且用力，對一切困難毫不顧慮，貴陽市政建設的若干工程，如體育場與公園的開闢，馬路與學校的建築，都是經他自己計劃，自己督工，甚至躬親一切極小的工作，這些成績，可說完全是他個人直接努力的結果，而體育運動與造林築路風氣之提倡，亦已遍及全省，楊先生個人對此實已盡其最大的努力，在豐度方面，他是毫無官僚氣息，任何人都可隨時接見，他初到任的時候，似乎還不耐輿論的批評，以後也漸漸的習慣了，只是他的個性太強，這也許是由於資格太老或久居高級將領地位所致，因此，他在政治上仍舊迷信他個人的權力與命令，未免把現階段的政治建設工作看得太單純，他總覺得他的見解是完全正確週到的，似乎說你們都是我的幹部或後輩，我的主張當然不會錯，你們只有聽從我，所以幹部們對他除了恭而敬之絕對服從以外，都不敢或不能直接向他提出辯論性的意見，他的權力與命令是否能貫徹到底？政治上有些什麼問題？很少有人反映給他，即使反映他也不見得完全相信，即使相信還不是又下一紙命令了事，很少拿當成一個問題虛心來和幹部們交換意見研究辦法之後而注視其澈底實行的，這便犯了「聖賢」的毛病，他希望這樣做，他的全體幹部是否照着他的意思去做他似乎不甚清楚，他如此實幹，他的全體幹部是否也是如此他也似乎不甚注意，結果，他只能直接運用他個人的能力和智慧，只知注意個體的活動，而不能充分運用政治機器，使其作整體的齊一的動作，也不能充分攝取各方意見，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如果我們的觀察不錯的話，這似乎是楊先生治黔工作在根本上值得研究的問題。

由行政技術方面來看，中國在此新舊交替時代，一切政治建設工作，舊的既無成規可循，新的有些還待實驗，有些不見得完全適合實際環境的需要，法令是死板的，也必須靈活運用，所以重要的政治措施問題，都需要創造與研究，單憑主官下一張帖子或由一個科員向壁虛構出來的辦法是不成功的，必須集合多數人才或博採各方意見研究一個切實具體的辦法出來，並須在實驗中不斷的改進，才有收效之望，以造林運動為例，這是貴州相當重要的一個國民經濟問題，然而主管機關似乎看得太簡單，除了空談種植技術而外，對於推行方式問題從來不肯加以檢討與研究，試問十幾年來造林的成績在那裏？到現在造林成績還是以株數來計算已是笑話了，何況株數？確實與否那只有天知道，這不過是一個淺近的例子，至於如何推行國民教育？如何調查戶口？如何充實人民自衛力量？……這些在貴州環境的行政技術上都是值得研究的專門問題，所以楊先生自倡導新貴州建設以來，我們就很希望他的高級行政幹部與專門人才能够組成一個研究行政技術的機構，把一切重要的政治建設問題加以研究後再付諸實施，惜乎他的幹部們不能事體來從事這一工作，有些想做而不能做，有些還不免有點「玩」政治的落伍觀念，不了解政治的建設是對事的是技術性的，誤以為是對人的是鬥爭性的，所以他們既不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想做事的辦法，而可能真與楊先生的計劃，又多屬於人事關係的應付或運用方面，反而造成地方人與人之間無謂的誤會與糾紛，使政府不能保持其超然做事的地位，應付益感困難這也可說是不重視研究行政技術的一種結果。

由政治意義方面來看，我們以為貴州政治建設，是以國民經濟與國民教育為兩大骨幹，所謂「國民」，它是含有「衆人」或「普遍」的意思，假使只有少數人受到教育的利益，不能稱為國民教育，只有少數人受到經濟利益，也不能稱為國民經濟，政治的進步與否，必須用這個尺度來衡量，我們不能說都市的進步就是整個政治建設的進步，因為都市只是「一點」，廣大的農村才是「一面」，如果對整個國民經濟與國民教育沒有普遍性的形式與內容一致的新動態，我們不能承認這是政治建設的進步，政治建設的成績並不完全是形而上的東西，風氣轉移或人心改造的成效雖然看不出來，但生產比較增加了多少？人民生活水準比較提高了多少？文盲比較減少了多少？這些都是可以用數字來表示的，然而今天貴州農村教育落後如故，農民生活痛苦如故，所以我們只承認貴州政治建設有些「點」的進步，而沒有「面」的進步。

由風氣方面來看，我們認為近年來貴州政治風氣和社會風氣都不很整肅，在政治上是恬嬉苟安者多，苦幹創造者少，由於待遇的微薄，對貧污者未能根絕，由於人事制度的不健全，間接對鑽營者予以鼓勵，我們一向主張用人須注意其品性精神學識能力四個條件，如四者不可得兼，毋寧先取品德，次取精神，然政府用人對此似未特別注意，在社會方面，由於都市虛浮的繁榮，都市生活不免有奢靡頹廢之傾向，由於不正當的選舉活動，每一地方均有形形色色之派系鬥爭，這些雖然不能歸咎政府，然政府決不宜放棄其倡導教化或強制的責任。

由政府與議會關係來看，多數都能通力合作，但有些行政官吏以為議會的最大目的不過是在找政府的缺點，只須設法對付運用一下，使議員們不說話就行了，不肯就事論事的來更換有關政治問題的意見，對付應用得好，自然勉強敷衍下去，否則就不免發生摩擦，摩擦到不能忍耐的時候，有些地方官吏更便利利用職權，捏造罪名，對議員個人採取報復行動，以求發洩私忿，成們不是認為議員的行動都是合法的，（議會當然也有缺點，但不是現在我們討論的範圍，）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執法者更應該守法，以為人民表率，我們向不必指出某一事件的誰是誰非，但我們似乎只聽議員被逮捕，沒有聽到官吏被逮捕難道說只有議員與人民會犯法，官吏就不會犯法嗎？在這培養人民法治觀念時期不能把此類事件看得太尋常。由邊胞政策方面來看，我們似乎不應強調調查貴州的邊胞問題，因為所謂邊胞問題，就是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必須以民族意識為要素。貴州雖有苗夷同胞的存在，但苗夷同胞的本身實在沒有特殊的民族意識，而且大都傾向漢化，並無離心的趨勢，我們研究歷史上的苗亂以至往年的黔東事變，並非起於民族意識問題，乃為受外界影響及政治不健全的结果，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固為民族構成之要素，但苗夷同胞雖有不同之方言，並無獨立

之文字，而方言與風俗習慣之不同，即同一民族亦在所不免，如驅逐與兩廣，又豈能稱為邊境或僑民？如果說貴州有邊境問題，那就只能說是普通人民文化程度與生活水準的問題，然文化程度與生活水準之不夠，豈僅苗夷同胞為然，漢人又何能例外？因此，我們認為貴州的邊境問題只是一個普通的政治問題，也就是國民經濟與國民教育的問題，今天漢人也沒有歧視邊境，如有同等的文化程度，即可享受同等的權利，政府只要致力於國民教育經濟問題的實際解決，或無形中側重苗夷同胞，自然就不會有所謂邊境問題，如果只靠強調口號而不做實事，那等於庸人自擾，適足以喚醒民族意識，造成相反的結果，同時邊境說也很難確定，半同化於苗夷的漢人和半同化於漢人的苗夷是否算邊境呢？土司又是否算邊境呢？在此行憲時期，一般淺識者都視選舉為爭取職位之機會，如徒強調邊境口號，又足以鼓勵投機，助長糾紛，可謂有損無益，我們也曾向政府貢獻過意見，但沒有得到重視。試問邊境政策除一些改裝的照片而外，還有些什麼有意義的成績。

由除弊方面來看，以最重要的禁政問題為例，我們固不能說政府對禁政的忽視，但只具消極的應付，沒有積極的想辦法，所以煙毒好似越禁越發達，一個鄉村的小市集，原來每一星期僅能秘密銷售煙土一二兩的，現在竟半公開的銷售十餘兩，原來只二三家秘密煙館，現在公然擴增到十餘個，大都市的到處有煙館，更是公開的祕密，完全沒有發現煙苗的縣份很少，武裝販運也時有所聞，這我們要說省縣政府不知道吧，未免有點不合理，要說知道而不問吧，也有點不近人情，然而事實確是如此，自然禁政問題是各地方互有連帶關係的，方鄰省鄰縣禁政的鬆弛，實足以影響本省本縣禁政的推行，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的不負責，機構的不健全，上下的隔閡，也就是魏德邁說「政治無能」。

由治安方面來看，一般人都以貴州的安定自傲，這確實值得珍惜，不過我總覺得這一種安定，是天然的原因多於人謀的原因，目前貴州保安團隊的力量，當然足以保證現狀的安定，但在此戰亂時期，我們必須預備對付有組織的共匪，自非在民衆組織方面作自衛的準備不可，何況今日貴州不但是自保問題，還要為西南的安定力，過去省參會建議警察除依原建制，由縣長直接統率指揮，俾能與民力密切實配合，但政府迄未付之實行。還有幫會問題，在結社自由與崇尚義氣方面來說，幫會組織原未可厚非，惟份子之真偽不齊，此為不容諱言之事實，現因地方選舉問題，不免全憑私感作用，小則分黨分派，播弄是非，大則弄刀弄槍，影響治安，故政府必須及早設法範圍其行動，作防患未然之計，如必俟其妨害治安後再加干涉，不免有一放任「與「不動而救」之嫌。

最後，再就五年建設計劃略加評論，我們以為這個計劃的成立，忽略了立法手續，不能保證其完成，因為這個計劃應屬於法律範圍，不是命令範圍，但僅由省行政會議初步作技術上的討論，沒有通過立法程序，不能成爲一種法案，雖已呈請中央批准，但由憲法的規定來看，這應該是省的立法範圍，必須由省參議會正式通過方能成立，否則甲來富省主席有一個五年計劃，乙來也可以來一個十年計劃，如果主席三年兩年更動一次，假可有若干不同的計劃出現，如計劃已有部份實施而告中斷，則不但不能保持其連續性，且所支付之代價豈不白費，再由技術方面觀察，也不類一個計劃，以國民教育為例，計劃中並沒有指出貴州有多少文盲？需要若干師資？若干經費？若干時間可以完成工作？一個工作計劃如果沒有數字的根據，就沒有實用的價值，不過是一種主觀的理想而已。

前述種種，就是我們對於楊先生治黔的觀感，所謂觀感，不過是對某一件事的觀察所得來的感想，感想是想到什麼說什麼，並非對某一特定問題的批判，因此，有些感想不僅適用於貴州政治建設的範疇，對一般建國工作亦可作如是觀，不過藉楊先生治黔，作為題材來研究罷了，至於楊先生對貴州自然有許多貢獻，比較具體的成績如市體育場與息烽溫泉之開闢之類，更永不會磨滅，一般人民感念貴州政治之維新而無制度，空泛而不切實，但對楊先生個人的建設熱忱與魄力，將永遠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完——

我們對於省政的期待

道謙

四月三日國民政府行政院臨時會召開，貴州省政主持者因有易人聞。楊森氏調長渝市，由谷正倫氏繼任。楊氏入主黔政，於茲三年，檢討政績，雖無奇觀，尙能平實推進，求進步之心，隨處可見。亦殊難得。

楊氏受命於黔南事變之後，谷氏則受命於「行憲」之一期，時事固不同，中央與地方期望之重則一，貴州土地面積有十七萬多平方公里，不小，人民有一千一百餘萬之衆，不算少，物產則地上者有夏冬季各種作物，復有經濟作物，桑葉，木材，桐油，蔴油，五糧子等，地下則有煤，鐵，鉛，汞等礦藏，不可謂不豐。且位居瀾，湘，川，桂之中心，扼西南交通之樞紐。地位之重。於焉可知。

故貴州之窮，實非窮於先天之不足，而實窮於後天之不振，所謂人謀不臧也。貴州自民國以來，可以說迄今土地未開發，物產因不豐，吏治未澄清，貪污成風氣，故農村人民疾苦至極，衣固不蔽體，食則無油鹽，反之，都市市儈，貪官，奸商等則大有「朱門酒肉臭」之概，窮者極修，狂嫖爛賭，無所不爲。若于公教人員亦陷入此不明不白之社會中，道德觀念之淪落，人心之浮蕩。政治之黑暗經濟之失調，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

長此以往，民何以堪。痛定思痛，實應反省，檢討過去卅六年間各種惡果之形成，似不外軍閥政治之作祟，政爭不息，內戰不止，以及民智不開，致爲少數野心家所把持操縱而已。

考貴州之政爭，民元以來，幾無間日。中間省政人選雖迭有更換，如民初劉氏（顯世）之執政，任（可澄）氏之繼任，民十以後唐（繼虞）氏之入援，彭（漢章）氏之秉政，周（西成）氏之執政，以至民十九後

毛（光翔），王（家烈），猶（國材）等之繼任皆是也，而其紛紜擾攘之像，雖縮短時二十餘年，但於國計民生所裨益者究爲何？迄今似尚有甚多未能定評者，至於是非功罪，如果真以人民福利爲尺度衡量，則不能不說功少罪多。蓋此時期中，人民之能安居樂業期間殊爲短暫也。誠以此期中并無益城屠殺破壞劇烈之事，但亦何嘗有奮發銳意建設？實？

廿三年政權由中央直接指揮控制，人心爲之振奮。惜初數年軍事頻仍，致未能脫軍事階段，二十七年後雖內閣結束，不帶外患繼之而起，卅三年後迎來勝利，抗戰結束，然東北，華北，甚至華中相繼又是遍地烽煙，貴州於此十餘年間，在軍事上前有朱毛之震撼，後則有黔東及黔南之事變，故中央入主黔政迄今，民生實未嘗安定，但人民省衣節食，窮糧達百萬石以上，納稅不下百億之多，以其財力而言，如此負擔，實未嘗後人，其次壯丁之出征，爲數亦不下百萬，貴州人民對於國家貢獻雖不算大，亦不能謂小，再就其對於國家智力之貢獻言，亦知貴州民智實非至愚。苟領導而有方，則人民之智力自開，財力亦可減少被剝削也。

谷氏以黔籍人士入主黔政，對於桑梓之關懷當爲衆所信賴，故願趁此就任之始，謹供數談，以爲參考。

分析貴州政會之由不外四端，乃以人未盡其才，地未盡其利，物未盡其用，貨未暢其流而已。此四者例不勝舉，隨處皆可見聞。以貴陽爲例，貴陽乃貴州首善之區，但游手好閒者之多，則無縣可以比倫也，至於鄉村情形雖較爲優良，然坐食階級之未進入生產門徑則亦比比皆是，故無論城鄉就業之情形皆可謂非常不充分，而「就業」之工作亦未敢謂

適當也。至於荒地之普遍，礦產有若無，貨物成本以運輸成本佔主要。又豈待證始明乎？故如欲使貴州富，此四者當爲主要之目標，苟能使此四者平行發展，則貴州不富自無其理。

然則人何以盡其才？曰：選賢與能當爲最理想之方法。必如此然後始能各得其所，各得其用，發其所長，去其所短也。惟貴州人才雖不多，但就業之機會則嫌少，故必同時發展各種生產事業，使人民皆有就業之機會不爲功。因必如此，然後始可息不必要之紛爭，蓋因今日甚多之紛爭多出於「粥少僧多」所致也。

地何盡其利？物何盡其用？曰：農，礦，工等業應真正調整其機構，一面發展其固有之基礎，一面必創辦新興之農礦工業。如此，則荒地可開，水利可興。地上及地下之資源，亦可得用也。

貨之如何暢其流。交通乃其惟一之關鍵。貴州無河運之利，空運則尙待時日，此時之可恃者，惟陸上之交通運輸，湘桂黔鐵道已達都勻，距建貴陽已不遠，但欲其確具經濟之價值，則不僅有賴早日抵達貴陽，更期由貴陽延長與川滇二省聯繫。且因此線僅穿過本省部份之區域，全面之貨暢其流，則除此鐵道以外，必更輔以公路然後可。故於所謂省際及縣際交通，亦必加速完成，然後貴州物產始可互相調濟。

以上四端當爲貴州進入富強之根基，貴州要成新貴州，此四者缺一不可。惟欲達此四端，以貴州現時政治環境論，則如不能先將此政治環境作澈底之澄清，雖不能確達目的，然其阻滯必多，所需時間必亦將較預期爲久也。

貴州現時政治環境究如何？言之實令人痛心疾首也。政治風尚之壞，政治制度之腐，而貪污已成風，逢迎則成務，人則以自私爲志。在上者可以賣官鬻爵，在下者則可以行下效，做官僅做官，不知做官當以做事爲中心，故民生如何疾苦可以不聞不問，而對上則必投其所好，因如此既可以達「包庇」，「偏私」，「行賄」，「爭寵」，「勾心鬥角」之目的。故一般政治人物皆以成立小組繼以伸其勢力爲能事，其他小

人則以加入小組繼分一杯羹爲得策，今日聯甲倒乙，明日又聯乙倒丙，精力智力皆耗於浪費，造成極端之偏私思想，是我集團內之人，無論其品行學問，亦不顧其操守信念，僅問能否爲己出死力，翻小話，聽命令，及能否爲其抓錢，苟能與其同流，則雖犯法違法亦無礙，反之，則屬異己，異己則排除。如爲反對派者，則更視其如仇讎。故人皆以法爲無用，視法如具文，而不得不奔走於權貴之門焉。此種禁無法推行，官箴無法整飭，幫會敢於公開開山設堂，土豪劣紳敢於把持地方，奸商市儈敢於囤積居奇，破壞法紀之繼續所在。故今違法者可以逍遙自在，甚至可以敢於以違法誇耀於人者亦以此。因有了錢，錢就可以買得「鬼挑担」，送「包袱」，分若干分之幾爲以酬，便可無事，故做奸人難，因為奸人將無法生存，壞人則反受鼓勵。貪污可得獎，作惡可得報，如此政治，誰尚願奉公守法？故在此自私業已籠罩的貴州政治環境下，私的觀念既不除，公的觀念被控制。故吾人對於前述四點根本工作之完成，認爲必以改造現時惡化政治環境爲先決條件。

因此，吾人不得不更積極提議，貴州建設當以心理建設爲先，以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及政治建設繼其後，再使其相輔相成，則貴州之政治方有光明前途。語云：「哀莫大於心死」，因心不正，邪念生，反勝不除，利不興，故除弊並不比興利難，要除弊，則又惟有一本至公，一切依法，固依法則不僅可以免徇私，更可以有規矩可循也。

省政至繁，若能以簡馭繁，萬變不離其宗。上既正，下必有甚焉。憲政將開始，貴州將入自治之途乎？抑仍蹈以往覆轍乎？谷氏以其宏量及其豐富之政治經驗，倡將導黔民於自治之途也。

谷氏曰昨有言。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一，幸哉！斯言。

種煙的情形，只不過是那些奸狡，縣長，各方掩蓋得好，沒有讓上峯知道罷了，要更實際審查的結果，貴州在三十五年度至少尚有五十縣局是種有鴉片的。

如今且連同三十六年度及三十七年度三月底以前所發現種煙的縣局繪圖以表示如次：



貴州省各縣種煙概況

觀右圖，當可看出「外人」來主黔政整整十四年，不但並未將煙毒禁絕，而且種煙的情形反而是地無分遠近與方位了！只不過是與鄰省的雲南和廣西在程度上稍有深淺之別而已，——雲南今年尚有數十縣擁鎗自衛種煙，廣西今年亦有若干縣公開普通種煙，而在黔省則只有偷種

鴉片。

乙 過去貴州禁政之檢討

貴州的鴉片既是如此普遍種植，故抽煙的人普遍於全省八十縣市局，不但是不分男女老幼，貧富貴賤，本省人與外省人，甚而公務員中之一部分，乃至警察局長，保衛大隊長，田賦處副處長，省師校長，公路局站長，以及巡邏保甲長之在產煙區域嗜煙如命，精神困乏萎靡致使勞力每況愈下固不用說，而使得家徒四壁財產蕩盡，尤現顯露之貧窮景象。其在另一方面則是販煙的人不僅兼及於省內外，抑且官商勾結上下其手，其普遍情形於此可知。

民國二十三年中央軍未入黔以前，貴州普遍種煙，公開抽煙，自由販煙，政府對人民乃苛以「禁煙罰金」之利弊得失姑置不論。日吳忠信，顧祝同薛岳等相繼主黔政以來，為時甚暫，並未對禁政有所努力，亦可略而不談，今只就吳鼎昌與楊森主黔對於禁政的成績來看，吳是二十六年來黔，預定三十年禁絕煙毒，而「提早一年」獲得中央的「嘉獎」的，此事尚有詩為證云：

「誰說名利難兩全，請看主席禁煙煙，提早一年得嘉獎，預藏十萬賺大錢……」

「預藏十萬賺大錢」，雖說此中是有秘密的，但於此已可以知他禁煙的成績了，因為生意經是「物以稀為貴」，假若貴州連年種煙，產量增多，怎能滿足他賺錢的慾望？可是他這種近於「只許官家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作風，和黔東的民變，望鎮、貞豐的民變，以及黎平的民變，……是不無關係的。

楊森繼吳鼎昌來主黔政，全省種煙的縣區竟達二分之一！還是吳鼎昌所不願意公開的祕密，如果說吳鼎昌禁煙是要名利雙收，那末，楊森禁煙則不得不說是與民爭利了，吳的作風已如前述，今就楊的作風舉例來說：他派出去查煙的人竟有在查獲的煙土包上寫明「請某科長呈主席觀啓」的字樣，被巡兵拿獲，而在民政廳主辦禁煙業務的這位主任科員

周漢章關在囚牢中年餘之後白白地作了一位替死鬼，而且貴州有所謂保甲隊，由外縣將烟膏運至貴陽，或由貴陽再運至川湘兩省，每百兩抽保費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五不等，之後便可暢行無阻，而保甲隊力量之大，嚇人聽聞，誰阻攔它誰就倒楣！如第三行政區的前任專員徐實圃因在興義逮捕一位保甲的大爺得罪於當道而去職，往後乃愈變本加厲在西路擅行設置烟毒檢查站，行商凡經過每一檢查站每包貨（百兩烟土）納過站稅三兩即可通行無阻，已成例規，此皆公開的祕密。這些，執政的當局要是不默許，他們真敢大胆如此！

丙 禁政不當徒滋擾民

唯因在上者欲假禁烟以牟利，而在下者乃益發變本加厲，最顯著的例子如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貴陽各家報紙共同披露的一則消息，其標題有爲：

祝邦杰劣跡昭彰

民新鄉十室九空

在這一則新聞中披露了楊森縱容他的部屬駐扎在三區的保訓司令祝邦杰在鴉片已收割之後的五月裏去到安龍屬的民新鄉借割烟爲名，實則是擄掠老百姓的情形。從而使吾人得悉：種烟的鄉農，因爲做了違法的事，經常要受到政府派來查割烟苗人員的擄掠，一次，二次，三次，以至七八次之多；當初烟苗從土裏長出時，割烟的人只要錢，並不認真將烟苗割掉，如祝邦杰即呈報三區的一位保警大隊附毛治平勒索望鎮鄉長王建綱種烟罰款六十萬元（三十四年底的數目）而政府派去割烟的人員，先是縣政府的科秘，後是縣長專員，另有警察局長與保警大隊長，還有保安副司令，確是你去我來，永無止境，每來一人，鄉農就要遭受一次敲榨勒索，而且還要負擔大隊人馬的食用，及至烟苗長成，開花結果，已屆收烟的時季，政府又派人來收烟租，如安龍警察局長方辟疆，率領員兵往化黎，樂平，興隆，合興等鄉鎮去坐收烟租，甚至在篤山鄉因收烟

租而打殺鄉農陳光德等情事，（據青年團出版之「安龍青年通訊」所載）之後，乃更在已過收烟煩瑣的季節藉以武裝擄掠鄉農，而且還要加以抗割烟苗的罪名，如祝邦杰之所爲與政府不加以防範正足以說明「上下其手」之屬實，以政府恣意侵蝕無辜地魚肉剝削老百姓，怎叫老百姓不爲求生而奮起武裝自衛？真覺驚嘆的民變由此而起，黎平的民變由此而起，黔東的民變由此而起，乃至本年春滇省若干地方的連串民變亦緣此而起，這真正叫做「官逼民反」。

丁 種烟的責任誰負

然而，追究責任，鄉農敢於種烟，難道真是不知道王法的鄉民？假若保甲長不包庇，鄉農有吃雷的膽子敢種烟？鄉鎮長不包庇保甲長敢於胡行亂爲？然而鄉鎮長敢於出此還不是與縣府的科秘有勾結？科秘敢於違法還不是得到縣長的同意？而縣長敢於舞弊還不是與專員有默契！再說專員敢於包庇種烟，還不是「上有好，下必有甚焉」的道理潛在其中？假若不相信不佞這話，且舉實例以證之：

一、保甲長包庇種烟 如荔波種烟通金縣，據三區專署的報告是保甲長包庇鄉農偷種者，又冊亨連央鄉乃言地方種烟爲保長王珍輝包庇，（據祝邦杰報告）

二、鄉鎮長包庇種烟 如水城順場鄉長潘仲和指使鄉農種烟；（據調查室諜報）又惠水茨塘鄉副鄉長羅朝陽擁槍偷種鴉片；（同前）再望鎮鄉長王建綱包庇王毓鎮，王卜鈞種烟。（據祝邦杰報告）

三、縣府科秘包庇種烟 如三區所屬的冊亨縣種烟通全境，據民政廳的「施政報告」上說是該縣政府的秘書劉永隆，民政科長趙鳴皋，和縣黨部的書記長蒙林包庇各鄉鎮長種烟者。（引同前報告書頁十八）

四、縣長包庇種烟 如冊亨縣政府的科秘包庇鄉鎮長種烟，及後來更處處包庇種烟的人時，縣長却將兩犯縱逃，這當然已够說明與縣長鄧平岩有關係了，又據三區專署及貞豐縣民的呈報，該縣縣長尹斌斌便

鄉長與人民種煙，每保先繳保證金五十萬元，（三十四年冬的數目）收煙時再照三七分攤。

五、專員包庇種煙 如第三區所轄的十四縣中即有八縣種有鴉片，而二區所轄的十縣中即有七縣種有鴉片，五區所轄的十一縣中即有六縣種有鴉片，實際上還不止此數，而且專員公署的所在地及其鄰境亦即是鴉片的盛產地，這現象還不够表明是專員在包庇種煙末？最現實的例子便是二區的專員董樹經因「禁煙不力」而被撤職，所謂「禁煙不力」云云只不過是政府的官樣文章，揭穿來說也就是因為包庇種煙太無顧慮結果讓內政部也無法掩飾，所以才給予撤職之處分，然而包庇種煙的專員，董樹經今天仍可大搖大擺地作其國大代表，至於在其上的人包庇種煙而榮膺要職步步高陞更不足為怪了。

戊 煙毒毀盡貴州人民的生機

在政府官吏與土豪劣紳包庇種煙十餘年的貴州人民，在以政府的輻勢為後盾而偷運鴉片十餘年的貴州人民，在政府默許抽煙十餘年的貴州人民，這一千多萬生活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之下的貴州人民，到得今日，已經呈現出兩個顯著的病態：

一為貴州人民普遍地消資

十餘年來偷種鴉片的結果，不但並未富裕農村經濟，反而摧毀了原有的脆弱的農村經濟基礎，因為偷種鴉片，不但影響了冬季農作物的播種與生產，而且影響到春耕的播種時期，原來是要偷種鴉片便不能兼種其他雜糧，而要保護煙苗與割煙漿，便無暇兼顧春耕，祇因鄉農偷種鴉片須時時防備政府官員的稽查割煙苗為名而實際則是漫無止境的敲詐勒索乃至於擄掠，其於有形與無形間之損失原是不可以道里計的，然而鄉農身受此種教訓之後，為何仍執迷不悟，仍繼續連年偷種鴉片呢？此中蓋有原因在：主要者則是一方面因為奉命查割煙苗者並不徹底執行，故鄉農仍可於縫隙中求生存，也就是因為種煙的利益較其他的農作物特優之故，而另一方面卻是被逼於土豪劣紳與鄉鎮保甲長乃至政府官吏的淫威而不得不買此天下之大不韙，蓋鄉

農離開土地即不能生存，而土豪劣紳却可直接操縱其土地之使用權，鄉鎮長與政府官吏亦可直接或間接操縱其土地之使用權，關於這，吾人且舉一顯例來加以證明藉以概見其他。

數月前在興義屬的貓街發生一件當地人所稱的「歐洛巴戰爭」，緣該地乃位於滇、黔、桂三省交界處所謂「三不管的插花地帶」，若干年來即為貴州西路軍販的耶露撤冷，當地的歐洛兩家各擁有自己的煙農，亦各顯有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在上年卻因利益的衝突乃發生劇烈的戰爭，雙方除使用新式的犀利武器之外，還配上迫擊砲與小鋼砲不足為奇，甚至乃開動了鄰近數縣的若干地痞流氓前往參加助戰，而這一批為利慾心驅使的助戰者果然如願以償了，他們各自獲得了多少不等的鴉片作酬勞而凱旋，這還不足為奇，最足使人驚異的是興義的某君接濟兩家的軍火貸款，在上年竟各逾五十萬萬元之鉅，且雙方訂立契約言明在今春煙稅收後，連本帶利一齊償還清楚，由此吾人當可相見鄉農偷種鴉片之原因所在矣。

種煙的利益既然只落在少數人的手中，一般鄉農並不因種煙而致富，這是社會制度所使然，鄉農在目前尚不可能取土豪劣紳鄉鎮長與政府官吏的地位而代之，固不足為怪。然而「偷種不著蝕把米」，鄉農却因種煙而口趨於貧餓是事實。

至於不種煙而只販煙者的命運是否與種煙者一樣呢？一般販煙者的命運大抵是不免於貧窮的，舉例來說：如像廣西近年來公開種煙，產量自然是有所增無已，而在鄰近南盤江的貴州人民，一江之隔却受到無窮的限制與滋擾，一般入遂放棄種煙而專幹販煙的勾當，故每年臨到鴉片上市的時期，（從陰歷二月至五月）過江去販運鴉片者日以萬計，可憐這般烟販十九都是「本小利微」者，他（她）們將家中稍微值得一兩錢的東西和糧食都一齊搜集過江去兌換鴉片，然而他們的所得不償所失，因為過江之後，他們常常會傳染疾病回來，而最流行的一種疾病是惡性瘧疾，當地人稱這種病為「打悶頭擺子」，十之六七多喪命於此病，因而為預防傳染疾病計，他們多認為吸食鴉片是無尚聖藥？故往廣西販運